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中共揭阳市委办公室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吴奎信 主编
徐光华

中共揭阳市委办公室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吴奎信 徐光华 主编

编辑：中共揭阳市委办公室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制作印刷：汕头市春风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汕头市潮阳区城南沧洲工业区
电话：（0754）3873939 3873839
传真：（0754）3861668
[Http://www.chunfeng-cn.com](http://www.chunfeng-cn.com)
E-mail:chunfeng@chunfeng-cn.com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5
字数：550千字
印数：1000册
版次：2005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ISBN 988-97484-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揭阳先秦两汉考古研究	曾 骐 邱立诚	1
揭阳考古新收获	魏 峻	17
广东揭阳两件手斧石器的初步研究	邱立诚 邓 聪	22
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考古 的初步收获	吴雪彬 邱立诚 曾 骐	32
从新发现的“汉武帝为揭阳令史定 赐姓‘揭’改名‘猛’”所引出的若干新说	徐光华	38
也谈潮汕地区的先民问题	黄 凡	52
古揭阳县历史发展过程初探	吴爱珊	62
明本潮州戏文《金花女》之语言考察	曾宪通	75
温潮同源 泉潮一腔 ——潮泉腔是明代南戏第五大声腔	李 平	85
略论潮州古戏文曲腔演进	郑志伟	107
南戏的起源和传播 ——兼谈潮泉戏剧对南戏的传承	张 烈	121
南戏精神在潮剧中的体现与传承	陈 骅	130

刘文龙故事的温州遗迹	沈不沉	142
新加坡联络所潮剧团概况	蔡碧霞	148
新加坡余娱儒乐社外江戏剧本初探	余淑娟	153
《刘希必》补考:		
从戏文的综合性探索“南戏现象”	陈历明	161
丁日昌的海防策略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郭伟川	168
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的史料价值	赵春晨	195
萧端蒙之经世治国观	陈泽泓	202
雍正胡恂《潮州府志》探踪	黄继澍	214
吴殿邦“附逆案”述评	曾楚楠	223
吴忠恕研究(一)		
——研究资料中的历史文献	黄 挺	243
林大钦道学思想初探	蔡金河	255
试论韩愈三首贬潮诗系年		
——兼论何时闻赦令量移令等几个问题	柯万成	263
一代儒将的风采		
——评唐顺之《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十八首》	庄义青	276
郑智勇若干史实辨	黎道纲	284
泰国侨批与银信局芻议	洪 林	297
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		
——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	李志贤	312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华人家族企业的应变能力

——以潮籍泰港两栖富豪黄子明家族为例	陈荆淮	335
丁日昌与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	郑智勇	348
越南潮人的中华和乡邦文化情缘	杨群熙	357
海外潮人家族企业探析	黄绮文	368
温廷敬及其诗	郑焕隆	379
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潮人文化	隗 蒂	394
商埠城市的金融行会与地方货币控制权		

——以七兑票时期的汕头为例	陈景熙	402
谈潮州的绅士阶层	黄瑾瑜	418
族谱对郭之奇抗清死节考的贡献	马楚坚	428
泰国潮州话初探	杨锡铭	443
《潮阳县志》“物产”卷校议	陈焕良	454
潮州方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魏素华	467
潮汕方言词零笈	陈伟武	474
“地域文化研究学者”之太极思维	陈香白	480
潮汕的成人礼	陈汉初	490
搜索古代文明——激活揭阳清代书画艺术	孙淑彦	507
国家与教会:汕头基督教教会的自立与分离	胡卫清	528
略论潮汕工艺美术成就及其艺术特色	杨坚平	549
潮汕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吴奎信	562

寻找几部旧版潮州歌册	郭马风	576
妇女服饰习俗的真相		
——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	吴榕青	583
黄月容出身考	贺益明	601
澄海樟林民俗	黄光武	609
潮州传统糕果甜品小食在马来西亚	苏庆华	630
潮人的文化心理及民俗艺术	田若虹	638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美育相结合、		
建设揭阳社区文化	陈文新	647
从戏曲宗教功能		
谈潮剧靠“神功戏”生存现象(提要)	郑少鸾	654
浅谈潮汕民间剪纸的继承与创新(提要)	黄凤珠	656
浅论揭阳榕城		
地名文化的语源特点和精华(提要)	郭伟忠	659
论潮汕美食中的潮人精神(提要)	陈友义 李昌欣	662
把桑浦山建成一个集文化、旅游、		
度假于一体的文化公园(提要)	蔡汉铭	664
浅谈潮汕民俗的农业属性及其特征(提要)	王伟深	667
潮汕明清墓葬风水浅说(提要)	林壁荣	670
后 记		
		674

揭阳先秦两汉考古研究

曾 骐 邱立诚

—

在祖国的南疆,广东东部有一片古老的土地——揭阳,即今天的潮汕平原,按最新的行政区域图,现分成揭阳、汕头、潮州三部份。“揭岭”最早见之文献是公元前 214 年,秦在统一岭南战争后,因战略需要,在揭岭设置了卫戍点,即文献所说,“嬴秦之戍揭岭”,既然是卫戍点,在漫长的山岭上就不只一处了。它应指粤东地区东北——西南走向的莲花山的山岭而与今天的五岭无关,因为秦人泛称五岭以南这个区域为南海,故秦代建置中有南海郡之设,郡领六县之一龙川县,县治便设在岭的西北。西汉南越国后期,依山而海的揭岭之阳,已见有揭阳令管治,史定就是最后一任揭阳令。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后,正式设置揭阳县,开始有了有史可查的郡县建置,其时的揭阳县除了整个潮梅地区外,还兼有闽南、赣西南,地域广阔。从西晋开始,这里曾先后出现东官郡、义安郡、海阳、潮阳等名称。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潮州”一名首次出现,北宋宣和三年,设揭阳县隶属潮州,基本上稳定在榕江(揭阳江)一带,为潮州所管辖。从历史上看,揭阳因有揭岭而产生,是揭岭之阳的地方,“揭阳”比“潮州”见之文献要早出 700 年。

揭阳江又称榕江、鮀江,这是后来的名字,它在粤东是仅次

于韩江的第二大河。由主干河——南河和一级支流北河汇合而成。全长 210 公里,流经丰顺、揭西、揭阳、普宁、潮阳、潮州,在汕头牛田洋入海,流域面积 4408 平方公里。榕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包括山地、丘陵、冲积平原、海滨低地等多种地貌,在沧海横流的洪水年代,这里还有大片沼泽地,后来才陆续形成海积平原、洪泛平原、沼泽平原。从地都经棉湖到揭西(河婆),北回归线横穿本境,提供了一个亚热带的生态环境。

今天的揭阳市全境管辖揭西、榕城(原揭阳县)、揭东、普宁、惠来。古揭阳文化是潮汕文化的组成部份,地下文物分布很丰富,可以追溯至史前,先秦时期,根据历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地下文化遗存的地点达 200 多处,包括有古遗址、墓葬、窑址、石器制造场和文物散布点,基本上覆盖了今天揭阳市全境。

1994~1996 年,我们对榕江流域进行了人类学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使用原揭阳县榕城和揭东县发现的 114 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资料制作遗址分布图时,发现这些遗存多数分布在北榕江以北的大小支流附近的山地,少量分布在南榕江西岸及其支流,为数更少的一些分布在东南面的桑浦山的西侧。从分布图上可看出古文化遗存大致分成五个聚落群,由西而东分别为白塔群 22 处、玉湖群 22 处、黄岐山群 44 处、桑浦山群 8 处以及榕江南岸仙桥群 18 处。其中黄岐山、北溪河、车田河、埔田一带遗址点分布十分密集,许多地点的文化层还呈现出多层文化的连续性。黄岐山是一座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 米的丘陵山岗,位于榕城区东北方向,在这里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 23 处,新石器时代、浮滨文化时期遗址 6 处、新石器时代、周代时期遗存 6 处,浮滨文化时期遗存(墓葬)6 处,周代时期遗存 3 处。位于埔田车田河河旁的宝山岑遗址傍山面河,有 1 米多厚的文化堆积物,文化内涵包括三组不同时期的遗物:

1、鼎、釜、罐、豆、盘等陶器和镞、铤、凿类石器的新石器时代

组；

2、属浮滨文化的尊、钵、豆、器座、罐、釉陶片及石戈、矛、环、璧、玦等玉石类；

3、饰夔纹的周代陶罐。

以上情况说明很早以来，先民就已稳定地择居在榕江流域这片沃土上^①。

二

追溯榕江流域的远古文化，那里是它历史脚步的起点？我们注意到揭阳博物馆馆藏的两件打制的手斧形石器。从田野记录上得知，它们分别来自埔田车田村马头嶼、新亨和硕村老鼠山。车田马头嶼标本上略呈三角状、燧石石片打制，器身保留小部分原砾面，采用两面交互打击加工，左右两个长边均修理较好的刃缘，底部较宽厚，有一个破裂面，经修整后呈弧球面方便手握，顶部修理成尖锋，长 9.5、宽 8、厚 2.4 厘米；老鼠山标本亦为燧石打制，形状大小稍近似车田马头嶼标本，略作长身，两端呈弧形，较窄的一端为较钝的尖锋。器身采用两面交互打击方法加工，可清晰看到第二步加工剥落的小石片疤，加工精细，两侧形成较锋利刃缘。底部保留有部份砾石面，长 9.7、宽 7、厚 2.9 厘米，这两件手斧石器不同于广东沿海贝丘、沙堤遗址出土的尖状石啄（蚝蛎啄），其打制工艺十分精细，成熟程度与之相距甚大，具有明显的旧石器时代风貌，在广东地区是首见，它们可能是揭阳人类最古老历史的见证。

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潮安陈桥村发现了含蚝蛎啄、尖状手斧、砍砸器等打制石器、刀、铲、凿、锥等骨器及夹砂夹蚌片陶器和墓葬遗迹的贝丘遗址^②。陈桥人过着渔猎采集生活，已能制造粗糙陶器和使用较多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距今年代约 6000 年。1991~1993 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南海海岛一个叫象山的临

近海湾的丘岗上发现了一个含细小石器的遗址⁽³⁾,石器标本多为黑色、棕色、灰白色燧石制作,石器形体扁薄细长,在2—4厘米之间,品种包括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钻等,刮削器的刮刃有多种形式,以人字形凹刃刮削器最具特色。大部份石器为单向加工,部份为两面交互加工,少数采用错向加工;但象山细小石器开头多不规则,反映出打制石器的随意性。把象山细小石器分别与福建漳州一带发现的“漳州文化”的细小石器⁽⁴⁾、广东南海西樵山发现的细石器文化⁽⁵⁾相比较,从石器原料、器形、制作工艺等方面观察,与前者相同而与后者相异。考古工作者推断,象山细小石器的年代暂定为距今8000年,这一发现使韩江流域的史前年代有了突破。这类文化遗存在榕江流域也有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丰顺县进行文物调查中,曾在附城邻近的汤屋山采集到4件燧石石器材料,有人字形多边刃刮削器,多边凹凸刮削器和两片长薄片,与南澳细小石器的材料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⁶⁾。丰顺位于揭阳北邻,是北榕江河的源头,丰顺汤屋山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在本区追踪细小石器的线索。

在榕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属山岗和台地型,贝丘遗址仅发现洪岗遗址一处,位于地都洪岗村榕江边的小山丘上,东坡堆积含陶片、石器、动物骨骼的蚝壳层,陶器有夹陶、泥质陶,其中部份器表涂有赭红陶衣,这个特点可与陈桥村相比较,但陶器纹饰已有复线梯格纹,年代上有晚于陈桥村的成份⁽⁷⁾。当然,在揭阳寻找像陈桥文化那样的古遗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在玉湖岗村发现的一处湖岗遗址,出土一批夹砂陶片,器壁粗糙,厚薄不匀,手制,低火候,陶片上饰细绳纹,可辨器形有侈口圜底釜、罐等,年代可能与陈桥相近;又如在玉窖乌犁村的伯公埕、曲溪五堆的山边园各采集到一件打制的盘状砍砸器,前者系用扁圆状砂页岩砾石在周边用交互打击法加工刃缘,直径11、厚3厘米,后者为盘状可用于切割的砍砸器,两面均有打击

加工,并且工在一个不大宽的边缘上加磨刃缘,刃口锋利,直径6.5、厚1.5厘米,这两件石器与陈桥村出土的石器有相似之处。

198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普宁虎头埔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址,共清理了十五座残窑,窑的结构基本上以平面8字形的横穴窑占多数,另有长方形、圆形、圆角方形,直壁平底的地穴式窑。个别圆形窑后壁有长方形烟道向外伸出,已很进步。

窑址地面及窑室内发现陶器和大批残陶片及制陶工具,陶器火候有高低不同,流行印纹陶拍打,有条纹、间断条纹、长方格纹、曲尺纹、圆圈纹、圈线纹、叶脉纹、编织纹等多种,陶器多为口部大小,颈部长短的矮圈足罐,陶器纹饰拍打均是通体拍打,腹部或肩部多贴饰附加堆饰泥条,少见素面陶器。纹饰以单一纹饰为主,组合纹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少,只有部份圆圈纹与叶脉纹或编织纹为组合纹⁽⁸⁾。虎头埔窑址的曲尺纹流行于圈足罐类,可与曲江县石峡新石器文化相比较⁽⁹⁾,纹饰中见云雷纹、夔纹,组合纹少而简单,以上特征基本上可以把它的上限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把它称为虎头埔类型或虎头埔文化,因为它在榕江流域有相当的典型性。

虎头埔类型的陶器流行于揭阳境内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仙桥赤岭口、埔田宝山寨、锡场三担村、东山黄岐山虎头岭、埔田金鸡寨、埔田世德堂水库、磐东南河村、地都华美等处,都出土有虎头埔类型陶器或陶片。已发掘的虎头埔窑址是一处规模很大的陶器生产场所,产品带有较多土著特点,它与上述诸遗址当有商贸交换关系。对应这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印纹陶种类繁多的佛山河宕遗址,虎头埔文化的年代可确定在距今4200~3600年间。

三

在揭阳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多件完整或可复原完整的带提

梁陶器,以其造型被称为“鸡形壶”,也是一种具地方特色的典型陶器。在玉湖关爷石、新亨老鼠山、仙桥粮所后、仙桥戏院后、云路中厦、曲溪五堆都有发现完整器物或可辨认的残陶片。仙桥粮所后的一件,为泥质黄褐陶,器宽体身长、侈口,器上部一侧有较大的流口,相对另一侧有斜翘的小管状流,联结这两端之间有宽扁提梁把手,器腹斜折,折线恰好在器身中部、圜凹底,自颈部以下饰方格纹,通高 15.5、口径 10、身长 21.8 厘米;云路中厦出土的一件,除器身高瘦窄体圆腹外,其它结构均与仙桥标本相似,通高 14、口径 8、身宽 13.6 厘米。

这类鸡形壶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曾发现过,麦兆汉的《粤东考古发现》(香港考古学家会 1975 年出版)记录了一件南澳出土的鸡形壶。在历年考古中,鸡形壶的踪迹在龙川坑子里、华城狮雄山、深圳咸头岭以及和平、饶平、香港都有发现,但数量最多的一批则是在榕江流域的普宁境内被发现。1983 年,考古工作者在普宁流沙附近的后山村一处高约 30 多米的小山岗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墓葬 10 座,获得了一批来自上、下部地层及墓葬的石器、陶器。后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是认识了代表一个时期的一群陶器组合,主要有方格纹鸡形壶、方格纹凹底折肩罐(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型)、平底罐、钵、豆、杯等^{〔10〕}。后山遗址还出土了 10 余件被称为“锉磨器”的石拍,是一种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工具,有可能是制作树皮布的拍打用器。

在这群组合陶器中,凹底罐最具特点,多为尖唇、敞口、折腹,器底浅内凹,颈以下拍打方格纹或细菱格纹,形式变化多,完整器总数 20 件之多;鸡形壶用做随葬陶器的一种,个体有 7 件,其中完整复原器 2 件,均属宽长身型,拍印方格纹或细方格纹。我们把有以上特点的文化遗存称之为后山类型^{〔11〕}。

后山类型在榕江流域有广泛的分布,而且范围扩大至韩江流域、东江流域甚至珠江三角洲、环珠江口。后山类型以圜凹底

代替虎头埔头类型的矮圈足是陶器制造工艺的简化和进步,在蛇形壶的基础上新增加了鸡形壶,象征着这里的土著山民把鸟图腾也带进了社会生活中,使原有的图腾崇拜更加复杂化。1997年在香港马湾岛东湾仔清理的一座属浮滨文化墓葬(编号C1044),出土陶器4件,另外有玉石饰物,其中长颈圈足壶、陶杯、罐等都具浮滨文化早期特征,另一件被称为双流壶的陶器形似皮囊,双小流口,鼓腹、素面平底、提梁消失,已不见后山类型鸡壶那种生动形态,但仍可看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¹²⁾。在浮滨文化中,鸡形壶最后终于消失了。

后山类型陶器纹饰较之虎头埔类型,种类与数量都锐减,为后来衔接的以素面、条纹、刻划符号、泥丸为装饰的浮滨文化陶器的出现做了准备。后山类型在榕江流域存在的时间经为距今3500~3300年,终于在浮滨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出现了新的局面。以鸡形壶为特征的后山文化遗存是榕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一种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

在榕江流域这类遗址中发现一种橙黄色或橙红色的陶器,在环形器身的一侧有高颈的壶口,全器似盘身昂首的蛇形,我们暂称其为“蛇形器”,有壶、盘两种。前者在黄岐山、华美等处有发现,马头寨发现的盘形器为夹砂灰褐陶,浅腹,圈平底,沿上接一圆柱形执把,呈蛇首状。黄岐山蛇形壶通高8、口径4.5厘米(图版)。这类陶器在广东其它地方或邻近的赣闽均未见发现,可视为榕江流域先民的土著特色,反映了土著居民的蛇图腾崇拜。

以凤凰山与潮州分隔的饶平,是浮滨文化的最初发现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饶平县浮滨塔仔金山、联饶顶大埔山清理了二十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遗物物200多件,连同早些时间已出土的器物多达300余件。石器类有戈、矛、铍、斧、凿、砺石及璜、环等饰物,陶器类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盘、钵、盂、罐和陶纺轮。陶器质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少数施酱褐色釉的釉

陶。发现有的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有文字,其中有以石戈、石矛、大口尊、深腹豆最具特色⁽¹³⁾。浮滨的考古发现后,考古学家曾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称之为浮滨类型。它有下列的几个方面引起人们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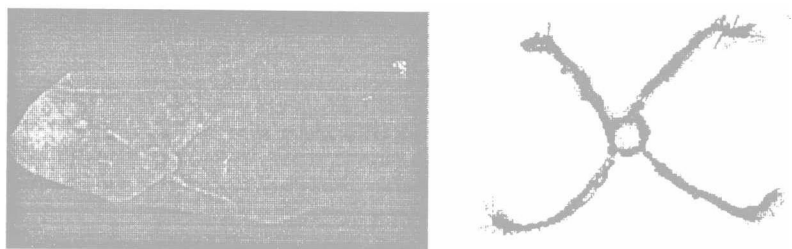
1、仿铜石戈数量很多、流行广泛,个别遗址发现有铜兵器及小件铜器,说明浮滨类型已属青铜文化;

2、浮滨类型的文化内涵带有若干中原商文化的色彩,如墓坑设置二层台陈放随葬品,出土较多的大口尊,基本特征是大敞口、平唇、长颈敛内收、折肩小平底、肩部饰乳钉泥丸。仿铜石戈形状与商代青铜直内戈完全一致,且制作精美;

3、文化分布范围随着时代的推进,比之虎头埔类型,后山类型更为扩大,除了粤东地区比较稠密外,在闽南地区也有许多发现,形成一支地跨粤、闽,分布在韩江、榕江、九龙江、晋江等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称之为浮滨文化⁽¹⁴⁾。

考古资料显示,榕江流域是浮滨文化分布的密集区,原揭阳县发现的 114 年先秦遗存中,浮滨文化遗存或含浮滨文化遗存占了 33 处,在前面提到的黄岐山聚落群中,浮滨文化遗存占了 12 处。十年前,我们在榕江流域进行人类学考察时,已经注意到本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土著特征的蛇形壶、鸡形壶外,已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多重性,此后,浮滨文化这支带中原色彩的文化融合了原有的后山类型土著文化,终于在榕江两岸出现了浮滨文化遗址群⁽¹⁵⁾。

在云路和新亨发现了三片釉质陶大口尊肩部残片有浅浮雕的符号,分别于大小圆圈与斜线相连接(图一),形成一个中间为圆心,四周近似 X 状的图形。我们曾以此符号辨析,认为存在一个以榕江平原为中心,地域相连的“浮滨王国”⁽¹⁶⁾。



图一 浮滨文化陶片上的符号

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观摩了实物之后，指出我们摹写失真，他对符号的重要性另作了推测，指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天象认识，即“四维及中央五星之状”，是王国对天象有某种信仰⁽¹⁷⁾。

有关天象的信仰或祭祀，《揭阳文物志》曾记录了 1984 年埔田金中岭莲花心小丘岗的发现，该地修建小学施工时，在地下深 60 厘米处出土了九组陶制小明器有罐、钵、高颈壶等，每组九件按十字形排列，各组排列相距均匀，每组中高颈壶壶口倒放，其余陶罐口朝天，陶器群外围有一圈大河卵石，类似民族学中常见的祭祀圈，可能是一种宗教祭祀的场面⁽¹⁸⁾。

接着要讨论的是仙桥出土的两件石璋，这是揭阳境内浮滨文化的最重要发现。榕江南河的仙桥镇也是浮滨文化分布的密集区，仙桥镇附近就有仙桥山、赤岭口等几处含浮滨文化的遗存，1975 年仙桥镇山前村出土了两件石璋。标本Ⅰ为灰黑色砂质板岩，璋身作长板状，顶端凹刃两歧成叉状，双尖略不对称，柄端内削出阑形榫状（或短柄），通长 25.5、刃口宽 6.2、厚 1 厘米；标本Ⅱ为浅灰色砂质板岩，质疏松有风化状，器身也作长板状，顶端凹刃，两歧成叉状，双尖对称，下端无阑，距柄端 7.5 厘米处有一圆孔，通长 27.9、刃口宽 5.6、厚 1 厘米。这两件标长均无鋸牙或扉棱。与石璋一起出土的其它遗物有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铤、

釉陶折腹豆、凹底带把流壶、折肩凹底罐,应是保留有后山类型因素浮滨文化器物群。石璋源自中原的玉质牙璋,出现于龙山文化,流行于夏商之际,近年来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墓葬中也有出土^[4],古人崇尚美玉,在诸玉礼器中,璋是众所周知的商代重要的礼器和祭祀中的宗教神器,仙桥石璋的出土,说明夏商文化的礼器随着中原文化向四方扩展、传播,其南下的一支在浮滨时期进入岭南。

榕江流域的浮滨文化遗存已被发现,以墓葬居多,清理过的地点在霖磐中学、炮台坡林、白塔大盘岭、地都油甘山、埔田金鸡岭、云路梅林坑山等处。梅林坑山有釉陶大口尊、圈足豆以及石、簠、凿等,还有青铜容器残件^[20]。

浮滨文化的居住遗址发现不多,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的普宁下架山镇牛伯山遗址,发现了浮滨人的居住遗迹、地窖、蓄水设施等,获得了一批浮滨文化的遗物^[21]。牛伯公遗址发掘的意义很大,第一次揭示了浮滨文化的聚落形态,同时也测定了一批可供参考的碳十四年代数据,6个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2870—3390年之内。

浮滨文化在岭南的出现,是商文化在南渐的过程中,一方面融合了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产生的新群体。它在陶器、石器、铜器以至埋葬习俗与商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些石器如凹石、印纹陶、条纹釉陶、有段铜铤等则反映了浮滨人所具有的上著特质。上述看法若能成立,华夏文化与南疆的土著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则由此被大大提早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揭阳(粤东)这片土地上,浮滨文化是“潮汕文化”积淀的底层及其渊源。

在揭阳新亨新岭矿场遗存中,有四件打制石胚用的石锤,是一类穿孔砂岩砾石,器身多见有砸击疤痕,这种石器又称穿孔石器,曾见于岭南新石器时期早期的洞穴遗存。这种石器除用作敲